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三九期 ——
(二〇〇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6d)

【当事者说】政治高压之下的“四一四”——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沈如槐
【史海钩沉】“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	聂树人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三）	刘文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说】

政治高压之下的“四一四”——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 沈如槐 •

〔本文作者为文革中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来与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主要负责人——编者〕

1967年5月12日，谢富治、丁国钰、周景芳到清华大学接见两派负责人，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我们，四一四核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接见。在单独接见四一四时，我们向他们汇报四一四的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谢富治根本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批评四一四说：“四一四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不对。”谢富治指责四一四把矛头指向蒯大富，指向群众。我们自然要争辩，可谢富治不愿意听。我这个人生性刚强，宁折不弯，看到谢富治这样对待四一四，很不服气，大声地与他进行争辩。谢富治对我极为不满，他指着我说：“你只能当闯将，不能当统帅。”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四一四要支持总部，首先要大联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谢富治离开清华后，有人散布消息说：谢富治单独接见团派时要蒯大富高姿态，不要讲四一四是保守势力，什么地方都有左中右，革命委员会也有左中右，让四一四一些人进革筹小组。团派造出的舆论是：谢富治要让四一四作为保守势力和右派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而蒯大富还对此不满，认为谢富治对四一四太软，让步太大，不应该同意四一四代表参加革筹小组。

从三纵队与蒯大富论战以来到四一四成立近一个月，第一次有中央领导专门来清华处理两派问题。而这第一次就否定了四一四的大方向，这对四一四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在四一四的核心组会上，我们仔细研究了谢富治的讲话和态度，认为他是蒯大富搬来的救兵，偏听偏信，有意打击四一四，为蒯大富撑腰；他不听四一四的申辩，轻易否定一个群众组织的大方向，是不妥的。在下午召开的四一四战斗组组长会议上我们如实传达了谢富治接见时的讲话。当时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不了解清华的情况，曾想组织部分四一四战士去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由于群众对中央文革心存畏惧，未果。很自然，四一四中充满了对谢富治的不满情绪。

5月13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清华四一四头头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四一四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锐：“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蒯大富把谢富治的讲话公开传达后，团派兴高采烈，在各种场合利用谢富治的讲话压四一四，特别是5月15晚团派召开的“促进革命派大联合”大会，对四一四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攻击，甚至扬言要对四一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连当时颇有影响的中间派“五七串联会”都看不过去，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央文革和谢富治对四一四采取的是不屑一顾、简单否定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形势；四一四想坚持真理，就要进行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我们认为谢富治来清华并没有耐心听取四一四的意见，他的“处理意见”是不符合清华的实际情况的，也是不利于清华大联合、三结合的。他到清华劳而无功，现在又想用总理和中央文革来压服四一四。我们没有屈服，继续坚持“四一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硬顶谢富治的批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硬顶会造成什么后果，为了表示四一四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在纪念四一四成立一周月的大会决议中我们引用了这样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段语录后来被四一四战士谱了曲，变成了《四一四战歌》，成为鼓舞四一四与团派斗争的有力武器，并导致陈楚三的牢狱之灾和四一四的“倒谢运动”。

谢富治来清华的目的是压四一四承认和服从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领导，无论谢富治和蒯大富怎样软硬兼施，我们就是不买这个帐，坚持反对革筹小组。我们确信，我们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现，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

◇ 四项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5月21日谢富治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两派负责人，四一四方面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我、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等六人。

这次接见，谢富治总的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批评四一四大方向的原则下，和稀泥，

搞三结合。”他还说：“我跟中央文革、周总理讲了，他们同意我的处虚理意见。”

谢富治不仅继续否定四一四的大方向，而且全面否定四一四的所谓“小道理”。

谈到四一四批评蒯大富的错误时，谢富治对我们说：“听说四一四要把总部打倒，你们是不是想让蒋南翔回来？”“不存在推翻蒯大富的问题，可现在你们就这样做了。”

谈到“蒯氏阶级路线”时，谢富治说：“是不是让蒋南翔回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蒯氏阶级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有那么严重？这么说罗征启比蒯大富还好了！”“罗征启是什么人？你们是要彭真出来，蒋南翔出来，刘、胡、何、艾出来吗？”

谈到干部问题时，谢富治说：“我们现在强调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等于过去批判错了。批判错了只是一个半个。这里有两条，一条是毛主席对干部的大政策、第二条是干部自己原来站错了。就是有过火，责任也在一小撮。否则就是翻案，大方向完全错了。讲平保平黑，那是完全错了。”谈到“两小撮”时，谢富治说：“只有一小撮，没有两小撮。”他警告参加接见的干部：“你们干部站出来要为大联合做贡献，不要只为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就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疾言厉色地对四一四代表说：“你们表面听中央文革的话，实际上不是的，将来要走向反面的。”他还说：“你们要不听话，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管了，让蒋南翔来管。”“你们再搞个总部，再搞个四一四学校？一条是一个总部、一个学校，第二条是让蒯大富下台。这第二条路走不通。”总而言之，谢富治采取高压政策，想一举制服四一四。谢富治之所以这样起劲地支持蒯大富，反对蒋南翔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打倒了彭真，谢富治取而代之，清华打倒了蒋南翔，蒯大富取而代之。

在对四一四一顿棒杀之后，谢富治主持两派协商谈判。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协商谈判，我们只不过将谢富治讲的几条原则变成文字而已。谢富治的几条原则是：一，停止互相攻击；二，统一领导，不准扶植山头的权威；三，大联合就不允许对立面存在；四，革筹小组成立后四一四就解散，革筹小组实际上是有权力的。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四项协议”，全文如下：

一、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二、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三、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四、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这无疑意味着把四一四的生杀大权交给团派。谈判时我方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它来压四一四，谢富治说：“协议还没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王良生说：“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28团，28团不改变态度四一四不放心。”谢富治说：“那不见得，你们要整风。”

这时我想起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新发表文章时改为“……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话：“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于是，我坚决要求取消第四条，我说：“正确的决议才能执行，错误的决议必须坚决抵制，否则就是奴隶主义”。

谢富治说：“奴隶主义是有阶级性的，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要统统执行，现在无政府主义可厉害了。”我仍不服，要求对第四条进行修改，提出在“决议”前加“正确”二字，即把协议的第四条改为“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正确决议必须执行。”

谢富治强硬地说：“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决不退让。”当他们煽动造反派向我们党夺权时，他们鼓吹抵制错误领导，而当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政权时，却又要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这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又是什么？

在谢富治的强大压力下，我们被迫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当时还确定了革筹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学生13，干部5人，教职员3人，共计21人。在学生中，团派为9人，四一四为4人，这就是九比四的来历。四一四推荐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和我为学生代表、龙连坤为干部代表、李振民为教职员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蒯大富任革筹小组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为副组长。

在讨论革筹小组名单时，团派只接受孙怒涛、汲鹏、王良生三人，坚决不同意我参加革筹小组。他们说我去在反对蒯大富和28团中最积极，没有资格参加革筹小组。四一四方面不得不向团派说明我是四一四的一把手，经谢富治表态同意后，团派代表才勉强接受我参加革筹小组。

回到清华，消息传出，四一四炸开了锅。六位谈判代表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接受他们愤怒的声讨。群众指责我们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让四一四任人宰割的协议。我们赶紧召开核心组会议，向大家汇报谈判的详细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会上大家都能体谅谈判代表当时的处境，对谢富治表示强烈不满。大家议来议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摆脱困境，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所以会议决定，由20名未参加谈判的勤务站成员发表声明，接受“四项协议”的前三条，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声明引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毛主席语录，指出第四条协议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既承认了“四项协议”，又保留了抵制总部某些决议的权利，以一种进退自如的姿态，来应付未来。

◇ 事态的发展。

然而，四一四群众反对“四项协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首先是东方红战团连夜发表著名的“5·21声明”，明确指出“四项协议”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东方红战团坚决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不接受革筹小组的一切领导。随后，反对“四项协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5月22日，四一四三七战团和其他近二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或完全反对“四项协议”，或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并指责四一四头头出卖四一四战士，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四一四群众如此强硬的态度使我们很受鼓舞。

可是，谢富治马上又打来一闷棍。5月22日深夜，谢富治的秘书打电话给清华两派，传

达他的指示：“你们总部和四一四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已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对你们有好处。”他的潜台词就是：谁反对“四项协议”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谁就没有好下场。在文革中，这样的大帽子谁也戴不起。我们四一四核心组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对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做出反应。5月23日2时30分，孙怒涛通过四一四广播台传达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在上午由总部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孙怒涛又代表四一四核心组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我们的目的是暗示四一四战士不要轻举妄动，要静观其变，以静制动。我们担心四一四还会有人贴大字报反对“四项协议”，怕他们遭到打击。

当天上午，清华园内，两派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团派欢欣鼓舞，四一四万马齐喑。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23日中午，东方红战团发表“紧急声明”，重申5·21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声明引用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表明为坚持真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心。紧接着，四一四主要负责人陈楚三、张雪梅等四人挺身而出，发表“郑重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声明，表示“任何人违反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两份声明的强硬立场给四一四战士极大的心理支撑。广大的四一四战士也没有在高压下屈服，纷纷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两派形成僵持局面。

不料，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5月24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治23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四一四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庆祝似乎已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最高指示：四一四上台，不行！”等口号响彻清华园。

随后，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议，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向四一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瓦解和摧毁四一四，二是立即成立革委会，从根本上巩固胜利成果。24日中午《611》战斗组的“最最紧急声明”和28团的“严正声明”就是明证。他们确定的口号是“充分发动群众，以大跃进的步伐，争分夺秒，日夜奋战，全力以赴，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28团在声明中说“四一四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四一四必须解散”、“东方红战团和陈楚三、张雪梅等人的声明是反革命大字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谢副总理，反对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罪责难逃”、“罗征启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24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5月30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提出50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当晚，鲍长康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毫无疑问，蒯大富和谢富治把四一四逼到了墙角。“四一四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给我们造成极其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在讨论时认为对于这段“最高指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不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心中很不服。起初我们还以为毛主席听信了谢富治的片面之词，但后来分析，毛主席对清华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他老人家确信清华四一四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蒯大富下台—四一四上台—蒋南翔回来”。可我们自己当时丝

丝毫没有这种意识。我们虽然反对蒯大富，主张解放干部，让干部成为三结合的领导核心，但并没有让蒋南翔复辟的思想，所以感到很冤屈，当然也不觉得很害怕。那么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呢？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极其神圣的，现在从蒯大富的口中随意说出来，其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

鉴于蒯大富有“贪污”和歪曲传达首长讲话的“前科”，我们暂且认定蒯大富伪造“最高指示”，不予理会。

在团派的强大攻势面前，四一四的队伍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稳定。三七战团发表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5·21声明，表示要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到最后胜利。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四一四核心力量的两大组织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一致。陈楚三、张雪梅等人更以大无畏的精神再次发表“严正声明”，继续坚持强硬立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准备为坚持真理而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与学生队伍一样，四一四的教职员工和干部队伍也是一支压不跨的队伍，四一四的干部代表龙连坤、魏宏波、谭浩强、胡大忻、王学芳联合发表声明，动农系25名干部和数力系13名干部分别发表声明，坚持认为四一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呼吁两派群众求同存异，共同对敌。四一四的一个战斗组写了一份题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字报，这个标题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处于政治高压之下四一四的状况。

□ 摘自沈如槐：《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

#### 【史海钩沉】

“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

· 聂树人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被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地点在大会堂一楼南部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多人，阵容与往来的重大接见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并排坐在一长溜桌子的北侧，与坐在南侧的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贞和我七人相比，人数要多，这显然是一个异常现象。

接通知去参加会议的我们七个人，当时是北京高校红卫兵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各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聂元梓是北大“新北大公社”的主要负责人，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闻名于世；蒯大富当时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因直接与刘少奇、王光美支持的叶林工作组“对阵”而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器重而出名。谭厚兰则是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的主要负责人。

以上三所大学是受世人关注的中国的第一流名牌大学，也是高干子弟的主要集中地。当时，政界上层的“旨意”往往通过这三所大学往外传出；中央级主流媒体更是经常将这三所高校作为主要报导对象之一。因此，文革初期，这三所学校的群众组织头头就随之成了那个时代的宠儿。

朱成昭是何许人？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名字显得很陌生。可是，这个名字在文革初期，同样曾名震京城内外，显赫一时。三十年多来，正规的非正规的有关文革的出版物中，都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质东方红”）的负责人笼统地写为王大宾。其实，在1967年2月之前，“地质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是朱成昭。在这次接见中，朱成昭即是以“地质东

方红”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的。

韩爱晶是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的主要负责人。

朱成昭与韩爱晶所代表的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与前述三个名牌大学比起来，在名份上，当时只能算得是二流或三流大学，他们的负责人能与前三所大学的负责人“平起平坐”，主要原因在于这两所学校造反派师生在文革初期出色的“造反”表现。

叶向贞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当时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她是以文艺口造反派代表的身份参加接见的。

我，原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名学生，此时是以“首都三司”核心组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接见的（附带说一句，“首都三司”从来没有“司令”“副司令”的“官衔”和称谓。几十年来，有关这件事的讹传太多了！）。当时，“首都三司”是北京近50所高校的约60多个红卫兵组织的联合体。

在这次接见中，坐在会议室西侧主不主、宾不宾位置上的一个女人引起我的注意。她头发花白，身穿灰色布料上衣，一眼看去就是一个十足的农村老太。我自8月底参与筹建“三司”，9月初进入三司工作以来，曾多次参加过中央领导的接见，对当时的中央上层人物都认识，对北京高校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相当熟悉。可这个女人是谁？使我颇费心思。她显然不会是某个高校新崛起的红卫兵头面人物——当时，该崛起的已经崛起。那么是新任中央领导？显然也不可能，因为她不坐在领导席上。当然更不会真是一名“农村老太”，——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场合，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身份的人物的。

那么，她是谁呢？在如此严肃的场合，我又不便于“交头接耳”询问，只好猜测，一个念头在我脑际闪现：可能是叶群。那时候，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已经出山，而声名显赫的林彪的老婆还没有公开露面。或许，她早就参加了中央领导接见群众代表和处理许多重大问题的会议，只不过因为没有在主席台上就坐，大部分人同我一样，把她混同于一般中央工作人员，“不识庐山真面目”就是了。

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好像也没有特别重要的内容或主题，只是交换或通报了高校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在众人闲谈中，江青突然认真而激动地对我们七个人说：

“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海瑞”指的是彭德怀。

在我的心目中，彭德怀是中国共产党中功勋卓著的元老之一。天下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谁都承认的。我的家乡（陕西汉中）刚解放时，“朱总司令”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是要高过毛泽东的，至少也是与毛并列。在游行队伍中人们第一次看见了标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名字的画像，但人们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发号施令、指挥军队的“朱总司令”才是打天下的头号领导人。因此，家乡人在称呼中对他们两人排的“座次”是“朱、毛”。

西北地区的百姓对彭德怀怀有特殊的感情，当然与他长期在陕北及西北转战和任职有关。我在上初中时，就读过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与其他开国元勋相比，彭老总还多了抗美援朝的

赫赫功勋。小时候的我深受这种感情气氛的影响，对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崇敬，如同虔诚的信徒，对他们一直是仰视着，望之弥高。后来听说了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倒了霉，但我家乡的村夫们（也包括我），自然是不明就里的。村里人没有探究宝塔尖上“世事变迁”的习惯——这些事情对于他们，如同千山万水之隔、天上地下之遥。如果有那么一星半点“新闻”传到这穷乡僻壤，那也往往是在事情发生好久以后，这些事毕竟与老百姓关系不那么直接。如果有人认为有关，当作一件正经事谈出来，反会受到大家的讪笑，成不了饭后茶余、场边地头的普遍话题。对于彭德怀，人们也只是像听《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知道他不当国防部长了。但是，他的威望并没有因此而在村人们的心目中有丝毫的降低，彭德怀还是那个彭德怀。

随着年龄的增大，从中学到大学，我对彭老总的观念从没有改变过。从1965年开始，发生的有关《海瑞罢官》的正误之争，虽然隐约觉得这事与彭老总有关，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上层文化人之间的笔墨官司，与老百姓无涉。彭德怀虽然失宠了，但是，作为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革命元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他是“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的头子。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在“工作队问题”刚告一段落的时候，江青却突然提出彭德怀的事，我很有些不解。对庐山会议上的情况我虽然一知半解，但是他在此次会议上为民请命，因此而“下野”，我是听说过的。无论人们私下里怎么看这件事，对他的问题，中央不是早已定案了？他自己不是也早已远离政治了？——在我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去西南局建委当个第三副主任，这已经是削职为民，至少也只是“死老虎”了。文化大革命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文化人，他怎么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对象？江青翻出这个老账来，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她意欲何为？

因此，在江青激动地对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特别注视了一眼周恩来总理的表情，遗憾的是，在他的脸上，我没有看到任何变化。在桌子那边坐着的大人物们，对此，同样没有赞同的表示，也没有反对的表示。犹如一缕风，江青的话似乎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东西，然而经验和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来自毛泽东的一个决策，毛泽东一定是点了头或画了圈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一缕清风而是预兆山雨欲来的那种风了

“彭老总又要倒霉了。”我心里不免有些悲伤。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下旬，江青有意激将他（应该是‘她’）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为此，戚本禹经过反复筹谋，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韩爱晶：现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要你们派学生到四川去把‘海瑞’带回北京。”

这段话有明显的杜撰成分。对于彭德怀这样一个党中央已经定了案的大人物，毛主席派到三线去工作的元帅，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就是江青、戚本禹这类当时的大人物，也是不敢下这样的命令的。而毛泽东1965年秋派彭德怀去三线，1966年冬又下令把他抓回来，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值得沉思。

此外，在我所见及的一些文章中，都把“揪彭德怀”这类事视为“一举”即可成为“英雄”，就可得“高官厚禄”的事；更有甚者，一些“作者”还干起了编造史实的勾当。其实，当时的大学生们大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在1966年6月下旬至7月底，不少大学生已经被划进了“右派”圈里，入了工作队党委的“另册”，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亲口尝到或闻到了“反党”、“反革命”的滋味。况且，在当权者朝荣夕囚的年代，不要说彭德怀这类早已被打倒了的“死老虎”，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乃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大



人物，都已经失去权势或在事实上被打倒；各高校内，都有昔日威风八面的当权派或“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上了批斗台。在那个时候，顺着上面的意思，打倒一个人，揪斗一个人，可以说都是“稀松平常事”。“揪彭德怀”，同样不过是奉命而为之的一件平常事。

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最高决策层抓彭德怀的指令并没有在大范围内传开，连聂元梓、蒯大富也不想利用“揪彭德怀”这件事“锦上添花”。具体涉入这件事的只有“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一心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我，对来自最高层的这个抓彭德怀的指令，心里总觉不是滋味。我回到“三司”，对此一直无动于衷，既未向各院校传达，更没有在“三司”工作中贯彻执行。因此，三司所属院校的红卫兵组织除“地质东方红”（朱成昭参加了这次接见，用不着我给传达）外，都没有参与抓彭德怀的行动。

描述“抓彭德怀”的具体过程有许多版本。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地质东方红”的红卫兵首先与彭德怀见了面，并与彭老总进行了不止一次的长谈，由于大家觉得彭老总在庐山为民请命，不应该被打倒，不应该再受磨难，至少，不能在我们“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的手中受磨难，因此，迟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具体负责这件事并与彭老总交谈过的王开来、郑文卿还从成都专程回到北京，希望阻止“抓彭”行动……

当“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犹豫不决的时候，“北航红旗”派往成都的七八个人也找到了彭德怀，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把他“抓”了起来，并在12月下旬的严冬中将彭德怀带到成都地质学院一个寒气袭人的大教室里。“地质东方红”红卫兵了解这一情况后，并不想将彭德怀“抢”到自己的手中。当时，“地质东方红”在成都至少有一百多人，此外，还有众多“三司”红卫兵可以“配合”。只是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在乘飞机还是坐火车问题上同“北航红旗”红卫兵发生了分歧。“北航红旗”红卫兵坚持坐飞机“押送”，“地质东方红”红卫兵建议他们坐火车“押送”。为此，“地质东方红”红卫兵还通过电话请求了周恩来总理，得到了支持。但是“北航红旗”的七八个人坚持要坐飞机。不得已，“地质东方红”红卫兵才将“北航红旗”的七八个人拨拉到一边，用大轿车将彭老总送到成都地质局，安排在该局招待所一个条件最好的套间里住了下来。此后，按照周总理的指令，在极严密的安全措施下，将彭老总“押上”了一节专门为他准备的软卧车厢，并伴同他回到北京。从成都到北京，彭德怀一直与“地质东方红”红卫兵及他的警卫参谋在一起，没有外人参与其中。彭老总到北京后，在地质学院住了一夜，第二天，“地质东方红”红卫兵才安全地将他交给由中央派来的解放军官兵。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彭老总被押送到北京卫戍区“监护”起来，从此失去了自由。

从对共和国元帅的“监护”也可以看出，“抓彭德怀”不是“地质东方红”或“北航红旗”负责人的“心血来潮”……

市场上，描述“抓彭德怀”的具体过程有许多版本，却没有“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的版本。据此可知，书市中关于“抓彭德怀”的绘声绘色的文字会含有多少水分！

我写此文还有一个目的，希望人们真实地记录历史，描述历史，反思历史，而不要随意杜撰历史，也不要以为写在纸上的就一定是事实。

能实话实说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才有未来。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三）

• 刘文忠 •

乘“胜”逼供信

我自小到大，从未清晨睡懒觉被打醒，不料在踏进牢房第三天早上，大约七点左右，睡梦中被一阵猛打惊醒。我睁开双眼，眼见看守凶神恶煞地举手还要打我，急忙一个沾溜从床上爬起来。

“小赤佬！装死鬼！反革命！你当作自己家里，可以困懒觉？像只猪猡吃吃困困？……”看守员边骂边退出去锁上牢房门。

天哪！昨夜审押返房已是凌晨三点多。由于进牢第一夜未合眼，昨夜眼皮搭牢，睡死了，也只有三个多小时。怎说我是睡懒觉呢？既是反革命，也无理由可申辩。我赶忙接盛了外面来的“放水”，擦把脸，胡乱地喝了一碗薄稀饭。正要揉揉刚才被打得伤痛的腰部、臀部，坐下来回忆一下昨夜审讯员所说的，想一想为何国庆节出门的细节被邻居偷看到……。突然，牢门外有人大喊：“1 5 4 8，提审！”

从此，那两个审讯员像催命鬼似的紧紧盯牢我不放。从上午八点半开始，除了午饭、晚饭时间稍歇片刻外，一直审讯到深夜十二点后。第四天又是上午、下午、夜里接连审讯，简直不给我一点喘息的机会。在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和他们列举的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我轻易设置的“堤防”节节崩溃，一路败北。我只得老实承认了国庆节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我承认了曾将自行车深夜借给辉哥，让他去交大、复旦、同济、一医、二医等大学里看大字报。我承认了文革开始以来把外面发生的动乱、散发的传单、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况收集告诉了辉哥……。我从踏进这里（上海市监狱第一看守所）三天四夜，接连九场密集审讯，计达五十个小时的折腾，胁迫、诱骗，遭过看守两次打骂，实在被搞得昏头昏脑，精神高度紧张，情绪沮丧崩溃，浑身伤痛累累。

我毕竟是涉世不深的残废青年工人。辉哥虽长我10岁，但多年来被内控迫害，近年来又完全是被监督专政的人。不知社会深浅的我们俩兄弟，怎料到早已身处“天罗地网”之中！从审讯员列举的所谓旁证，我才恍然大悟。自从辉哥今年（66年）从嵊泗厂被押送返沪，他与我、以及父亲三人一起居住在二楼的16室。同楼的左右隔壁邻居都是我大姐同厂（江南造船厂）职工，其中多数人受派出所和里委会委派，负责监视辉哥的一举一动。我父亲早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自然也在被监视之内。我虽说在厂里是个办公室小干部，但与父兄同住一起，早夜进出情况也都在邻居的密切注意之中。我在国庆节早出夜归的异常情况，早已被汇报到派出所。前几个月，每天夜里九、十点钟，我把自行车推到附近的市民新村里，然后辉哥悄悄地溜出家门，到市民新村骑自行车去各大学观看大字报。当时我与辉哥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谁知都被负责监视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向里委和派出所检举告发。我上个月到外地串联，人刚走，单位造反派大字报就贴到徐汇区委大院，说厂里领导包庇反革命子弟冒充红卫兵，到北京去搞反革命串联。徐汇区公安局上报上海市公安局，市局立刻通知北京公安局，密切监视我的行踪。所以我在北京停留五天的情况，公安局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当时还以为自由自在，其实身边早已有密探在跟踪监视。还有，辉哥熬通宵所写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抄写成十四份，叫我到杭州邮寄给十四所高等院校。当时想匿名易地投寄，万无一失，毫无蛛丝马迹可被公安局抓牢。殊不知我们年轻无知，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夜里被捕时，便衣警察把我们居住的16室内彻底搜查翻遍，被他们找到了抄写匿名信多余下来的信纸信封，同时查获了辉

哥所写读书笔记的手迹。这些同寄出的匿名信一对照，显然完全一致。所谓“人证物证俱在，岂容抵赖”，我再强辩硬抗也无济于事。

辉哥因给厂里领导提整风意见，又替父亲抱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向古今中外书海报刊寻求真理。他向往民主、自由、平等，主动调往浙江嵊泗厂工作，曾一度打算偷渡出境。不料，罪上加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66年春末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后，心中的理想之火不灭，他自文革开始密切关注时局发展，夜夜去街上和大学里观看大字报，他发觉国家的大灾难临头了，中华民族的大灾难临头了，中国国家栋梁、革命志士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大灾难临头了。所以他不顾待罪而失去自由之身，握起如椽之笔，写下了彻底批评毛泽东亲自制造的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早已准备“我以我血荐轩辕”，准备“我自横刀向天笑”，愿为中华民族的苦难危局奉献青春与生命。他只想以死谏阻断逆流，从未设想计谋保全自身。11月26日清晨我从串联回家，告诉他同学沈兴定所说的有人已去学校调查一事，辉哥已觉东窗事发，他叫我快些上楼休息，自己给我洗掉了外出串联穿的全部衣衫，根本没有同我商量一旦出事如何应变的办法。这天傍晚，在苏州当厂长的二哥文兵，因带工人去青岛实习路过上海，突然回家看望父母亲。三姐文珠（在陕西工作，这时正在上海养产）与二哥文兵一起去附近派出所，请求给辉哥在里弄临时找点工作做做，以解缓他的彷徨苦闷。但见派出所民警群集，紧急开会。他们赶忙回家告诉父母与辉哥。辉哥抱着三姐刚养45天的外甥女彤蕾，呆呆地坐在底楼4室的母亲房里，一声不吭地连坐了二个多小时。辉哥思想斗争激烈，却不知派出所开会目的，他丝毫未作任何潜逃的打算。他知道自己所处环境险恶和可能出现凶兆，所以紧紧地抱着刚出世的第三代外甥女，亲了又亲，久久不能放手。他无非在想，等待外甥女这一代长大后，中华民族总该有舒畅的好日子了吧……。

辉哥敢作敢为，明知杀头事，竟然拼死干。他没有策划任何退路，更没有教我如何躲避，所以在审讯员的所谓大量罪证下，我自认被打垮了。两位审讯员连续作战，终获“胜利”，对我这个投寄反革命匿名信一案，已“铁证如山”，我确实也“供认不讳”了。我想这下子他们总可以放过我了吧。谁知在第九场深夜审讯中，矮胖子审讯员露出得意的奸笑，装出从未有过的和缓态度，假惺惺地说：

“1548，你毕竟知罪服罪了，我们欢迎。但是，你要坦白彻底，才能得到政府宽大处理。”

“我知道的，所干的，全都交代了，还有什么不彻底？”我被他说得又迷蒙糊涂，心烦意乱了。

“不！你还没有彻底！看你态度有转变，我点你二点：一：这个反革命案件，绝不止你与刘文辉兄弟两人，必然是个团伙作案，你要老实一一交代其它人（刘文辉的朋友、同学，包括其它兄弟）是谁？二：你外出串联，到北京阴谋活动五天后就乘车南下，直至四川成都，肯定是去找你四川的哥哥和在云南的哥哥，你们想策划去广州边境，探测偷渡出境的路线。你要老实交代刘文辉如何指使你去串连其它二位哥哥一起叛逃的？”

辉哥向来深于思考，探索自由，又敢做敢当，匿名信这件事，我知道纯粹是我们两人所为，我看过全文，并帮他复写了一部分内容，现在我坦白了，他们却得寸进尺，恶毒地设计加害我们一家，把几个哥哥以莫须有的罪名一起陷害进去。所以当矮胖子如此捏造罪名时，我疲惫万分的残躯顿时怒火中烧，用足力气大声呼喊：“没有！绝对没有！其它兄弟姐妹谁都不知道这件事！也不存在合伙叛逃之事。”

矮胖子审讯员大拍桌子骂道：“死顽固！反革命！花岗脑袋！你们兄弟串连不是很密切吗！那天你苏州的哥哥还来家里秘密活动，你当我们不知道吗？说！不说——死路等着你！”我回答我二哥是共产党员，是个革命干部。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干的事，他跟我三哥是死对头。

任凭他暴跳八丈高，我气愤愤地怒目盯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了。

绝食死抗争

我在贤母的谆谆教导下，自小不会说谎，更不会圆谎。所以当国庆节行踪被审讯员突破后，和盘托出了文革初起为辉哥打听时局发展的活动事实。但是当他们硬逼我交代所谓“团伙”“叛逃”等莫须有罪行，我怒火填膺，誓死否认。我知道他们在设圈套，加害于我其它几位兄长，我斩钉截铁地，把他们恶意打开的魔鬼大门死死顶住了。不知是我誓死不屈的态度吓退了他们，还是他们自知在我身上已找不到所要的“材料”，第四天深夜二点多点那场审讯过后，竟然再也不喊“提审1548”了。但我惊讶的是，几年后当我看到辉哥的判决书中他们为了罗列更多罪名致辉哥于死地，还是无中生有加上了所谓“唆使刘文忠串联其它两位兄弟在广州组织偷渡叛逃”一事。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从进牢房第五天起，没有了“提审”的麻烦，高度的精神紧张松懈了，在牢房中吃点粗饭薄粥，可以闭目养神，无聊打发日子。起先只是想辉哥现今怎么样，被他们刑讯逼供到什么地步。辉哥“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肯定同他们针锋相对，顽强抗争，吃的苦头必然比我多得多。一天听到看守在二楼一间间通知“放风、放风”。我从《红岩》小说里知道“放风”是犯人出来走动走动。我不由得一阵激动，心想一定像渣滓洞政治犯一样集体在一个大院子里活动，我能看到许多人，说不定辉哥也在里面。我的牢房是底楼102室，是二楼下来去院子必经的最后第二间，我从房门上送饭的小框门夹缝中可以隐隐约约看得见。

“底楼，放风的下来了！”随着二楼看守的叫喊，只听见“哐啷哐啷”一声声开牢门，一阵阵脚步声下楼来。我悄悄把脸贴在小框门夹缝里张望，细心地数着，发觉二楼有20间牢房，三楼也差不多。惊奇的是有的牢房出来的犯人有14个，一般牢房八九个，单身关的房间竟不多。“我为什么一个人关着？”心里禁不住自问。没有看见辉哥的身影，自己又未轮到“放风”，惟有死一般寂沉笼罩心头。

在牢房中，早晨七点起床，到夜里九点上床，每天长达十四个小时的孤独、恐惧、胡思乱想，像独自一人躺在暗无天日的墓窟里一般。起初密集提审，精神高度紧张，牢房仅是个睡觉的地方。现今多日不提审，似乎希望门外喊去审问，也可以接触一点活人，从他们的叫骂训斥中，辨析得知外面世界的一丝一毫动静。可是他们似乎有意要把我冰冻起来，再也不来审讯、骚扰我。记得有位哲人说过：“失去了自由才知自由之可贵。”我看见窗外院子树上小鸟飞来飞去，自由自在，可是我呢？前几天还在外面走南闯北大串联，现今却孤身陷入牢狱。我见不着人，听不见说话声，只见牢房四边墙壁，大白天阳光灿烂，牢房里却是阴暗一片。我真想大喊大叫，想用头去撞那牢门，但我明白，这种疯狂心理是很危险可怕的。我在他们眼里是个“现行反革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死囚犯。一旦我高喊大叫，非得招他们来再狠毒地吃耳光，兜头拦脑地毒打一顿，说不定小命丧在他们手里。我死不足惜，可是老父母在堂，辉哥事情如何了结，岂不是白白送死吗？但我怎么也禁不住孤寂的折磨，设法在这活人的墓坎中发出点生气，于是我自言自语哼唱歌曲来镇定自己。不料歌声稍高了点，就被门外看守听见，重重地敲打牢门骂道：“1548，反革命在嚷什么？老实点，不许出声！”可见做了政治犯，连呼吸一口空气也是被监视管制的！在寂静的、死气沉沉的牢房墓窟里，我只好形影子立，呆望窗外的天空；或独自恍惚徘徊，一步一步地数着牢房四壁间的距离。

我开始在我存在的孤独世界里寻找生命的伙伴，细心地，一寸墙壁一寸水泥地寻找，又向这十多立方米的空间观望，希望找到一只蚊子、一只蜘蛛、一个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但是我失败了。世上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避绝了我，故意要把我活活地窒息死亡。我心中闷得要发疯了，

血管流淌的热血要爆炸了，让我同这黑暗的坟墓一起炸毁埋葬吧！渣滓洞里还有隔壁难友敲打墙壁的声音，可是共产党的牢房隔音技术水准特高，除了门外（送饭的小洞里）偶尔传来看守的一二声吆喝外，左右犯人的室壁动静无声，数百人可以同时沉寂在一座庞大的坟墓中，也可以称得上“国际先进水平”了。不料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夜静更深我起床小便时，竟从便洞里传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后来我研究出，贴近的两间牢房冲便桶的下水管道是相通的，如果把马桶盖拿掉，把耳贴在马桶口，是能听到隔壁犯人的声音的。接连几天夜里我起来偷听，从马桶里传出凄楚的“夜半歌声”；一会儿嚤嚤泣泣，比号啕大哭更可怕；一会儿在忧怨泣诉，令人毛骨悚然；一会儿像远处的狼一样嚎叫道：“我无罪啊！放我出去吧！”我估计隔壁的犯人被逼疯了，否则怎会夜半三更还在肆无忌惮地控诉呢？……

我开始失眠了，有时通宵难以合眼，醒着的时光，眼瞪着房顶那只40支光贼亮的电灯，更是痛苦难熬啊！这样下去，我不是也会被孤闷、冰冻、迷迷茫茫逼得发疯吗？我为什么不可与其它犯人同居呢？孤独一人关押，非得逼疯不可！

接连几夜通宵失眠，身体顿觉消瘦下来，开始步履沉重。24天过去了，我深知了单身监禁的可怕，原来这是一种比凶狠审讯更严重的刑罚，如此灰暗，死人般躺在棺材、埋进坟场里的可怕处境，夜半又习惯要听毛骨悚然的狼吟鬼泣，我一天天消瘦下去的残躯还能坚持多久？我想起辉哥教我阅读的一本书《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记述他在独裁者统治的监狱里被单身关了17天的遭遇，他说：“这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绝无的，是违反人道的，为之要向联合国起诉。”我想，我这个刚交20岁的青年工人已关了24天，去向谁申诉？我又想起英国狄更斯《双城记》中那位可怜的老师，被关在巴士底狱中27年，出狱时连他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看来死关下去必然被关死无疑，还得要自己抗争，跳出单身监禁牢囚。既然门外“放风”时看到有那么多牢房众人合居，我为什么不能关到他们那里去？当然，向审讯员或看守要求，是与虎谋皮，绝无可能，自杀也无工具，何况自己还想活下去看看倒行逆施者的下场如何。唯一办法只有自己折磨自己，病倒下来，共产党也讲人道主义，总得让我离开单身监禁吧！

我夜半被捕，投入监牢时，随身只穿秋衣薄裤。一星期后，家中才被允许送来了棉衣棉裤。我决心折磨自己，就把穿上的棉衣裤全都脱掉，单衣薄片情愿受冻，夜里睡觉也不盖被子。十二月份的上海寒气逼人，牢里水泥房更似冰冻窟窿，我希望冻出病来。监饭本来粗糙难咽，厨房师傅大概站稳革命立场，折难犯人，有时菜里故意不放盐或故意不把菜洗干净，泥沙渗在饭菜里，根本难以咀嚼吞咽。我干脆不吃不喝，接连三天把饭与水偷偷倒在便桶里冲掉。我绝食抗争，彻夜不眠，开始冷得牙齿颤抖，浑身寒虚，高烧很快上升，嘴唇烧得布满水泡，终于在第29天彻底病倒了。监狱医生进牢房给我量体温打针吃药，我在迷迷糊糊中把留下的药倒在便桶里，继续折磨自己。过了两天，我已昏迷不醒，隐约感觉被人抬出牢房。

当我清醒过来时，已发觉躺在一间不大的陌生病房里，盖的是红十字被子，鼻腔插着葡萄糖输液管，手上插着吊注药水的针头。从24小时不离病房的劳役犯嘴里得知，我已在提蓝桥市监狱医院躺了三天了。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又诊断我的肠胃很长时间未进食，是属想不开慢性自杀。第五天我病情好转，停止输液，开始进食。第一看守所医生带我回所。乘坐的是一辆密封的救护车，同车的还有一位中年人，听说是吞牙刷自杀未遂，去洗胃的。

在回所的路上，我装着可怜向医生要求调房，说我患过小儿麻痹症，左脚拐瘸，关节有病，现住的底楼朝北水泥地太阴湿，实在旧病酸痛复发受不了。医生只说“绝食不吃饭对你没有好处，你刚出院，回所后可能需要人照看”，就默然无语了。我心想他没有说“不行”，还存一丝希望。回到102牢房，半小时后只听看守“啪”一声打开门上小框洞说：“整理好东西调房。”我心里一喜：医生毕竟是人道的。

自讨苦头吃

我提着简单行李，拖着瘸腿而虚弱的病体，跟着看守走上二楼，到朝南的204牢房。我刚踏进门，吓了一跳，差一点叫出来。满满一屋子犯人，整齐地靠墙坐着，我一数竟有十一人！老天可怜人，医生太人道，我得解救了，总算告别了单身监禁的日子。

回到了人群中，我虽然与他们素不相识，却有股亲切的暖流萦绕心中。好似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我充满渴望的眼光同他们22只茫然的眼睛对视了足足二、三分钟。只听看守叫“1504”帮我安排座位，我才回过神来。那个名叫1504的年青人帮我麻利地把行李分开，将被子等堆放公共处，用我的替换衣裤打成一个坐垫，放在马桶边，告诉说这一座位是我白天蹲坐、晚上摊铺睡觉的地方。从此不准随便挪动，除非有新犯人进来顶替，才可上升“一级”——离开马桶一尺。我脱离单身监禁寂茫苦海已感幸运，也不计较他再讲什么。当我一屁股坐定下来，再仔细看他们，才发觉个个精神苍老，眼神疲惫，人人呆若木鸡似的。而正好他们十一个人也在迷蒙地紧盯我看，他们无非在想，这个残疾年青人是个什么角色？想问我又谁也不肯先开口，嘴角翕动，欲言又止。后来我才知道，这间牢房已有一年多没有新犯人进来。今日看到像我这样的瘸腿残疾，年纪又比他们轻得多，突然挤进来，颇感意外。终于帮我整理座位的1504开口问了我：番号多少？今年几岁？什么地方人？在外做什么职业？是什么时间进来的？……我当时很兴奋，进监31天第一次碰到这么多同类人，这里多热闹，回想前些日子孤单、寂寞，闷得想发疯的苦熬，我心里阵阵惊喜，很想大声说话。但我已知狱规，不敢任意高谈，只是轻声地有问必答，甚至他们不问我我也想找话讲。我太想跟人讲话了，也太想了解这里的一切，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进来？我辉哥可能关在哪里？我自己会有什么后果？一连串的疑问冒上心头，都想从这些看上去关押已久、估计有涵养有见识的老犯人那里了解一二。

我毕竟是个不知深浅的青年工人，又像鲁滨逊孤独漂流在荒岛许久日子后回到社会上那样，迫不及待地想主动亲近人们，一时忘记了这里是监禁囚犯的牢房。而他们当知道我才进狱一个月，个个显得惊奇万分，说我肯定知道外面世上的混乱情况。他们告诉说，已有两个月停发了解放日报阅读，这是关了十多年的老犯人所从未遇到的蹊跷事。他们像一群与世隔绝的两脚动物，偶然去市监狱医院的路上，或在提审、放风中隐约感觉外面世道又起了严重变化，国家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报纸停发前，已从报上看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扫四旧”一连串新鲜名称。正想知道其中详细动向，不料消息管道的大门骤然关闭，似乎两眼一抹黑，什么形势大局都不知道了。于是他们陆续向我打听、提问，一个个紧催着我说说外面的情况。这下子我可来劲了，俨然像老师教学生那般向他们解释这些新名字的内容，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从去年开始报上批判《海瑞罢官》，今年五月开始报上批判《三家村》，六月正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近半年来“文革”掀起的红色狂飙已席卷全中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千千万万的造反派、红卫兵大扫“四旧”，社会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打、砸、抢、抓、抄”，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毛主席大力支持、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万红卫兵小将。“我曾在上个月串联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亲眼看见毛泽东乘坐敞篷车，向我们挥手致意呢！”此话一出，同监十一人全都惊呆，感到我这个人新奇异常，讲的消息骇人听闻，都催促我再说下去。惟独其中一位人称“校长”的老犯人阻止道：“你们不要再问他了，要害他的。”

信口开了河，话语像激浪瀑布直冲而下，我自己已止不住；听的人更是推波助澜，催我快快讲下去，全然不顾“校长”的劝阻。我权威般地发布消息说：上海已有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周信芳等数十名大学名教授、社会名人被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在文化广场开过许多场批斗大会。各大学的教授权威几乎都被打倒在地，还说要“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全国各地工人农民也起来造反，大规模地揪斗各级走资派。我告诉他们在全国大串联时亲眼目睹的见闻：在北大、清华看到斗吴晗、邓拓、廖沫沙，斗清华校长蒋南翔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北师大造反派女头头谭厚兰带领一批红卫兵冲到山东曲阜，挖掘孔坟，砸烂孔庙，捣毁孔林。

我还告诉他们，上海宋庆龄居址和南京中山陵都被红卫兵贴满了大字报，受到多次冲击。北京著名作家老舍、傅雷与上海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等人已相继自杀身亡。巴金、周扬、马思聪……无数有名的文化人都在遭受残酷批斗。坐听的人都一声不响地低头叹息，有的老犯人流下泪，连声“作孽、作孽啊！”一位老人又说：“这不是焚书坑儒吗？！”当我继续告诉他们，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中宣部长陆定一、组织部长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全都被打倒，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也摇摇欲坠，连遭批斗，坐听的人纷纷惊奇摇头。我又忍不住告诉他们，在我进监前，北京十多所高等院校数十万名红卫兵已组织“揪刘火线部”，贴出了“揪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字报，把刘少奇主席重重围困在家里几天几夜……。（作者记忆有误，“揪刘火线部”等事发生在1967年，不是在作者入狱前。——编注）一个10座的犯人顿时激动地反驳：“你造谣，不可能的事，难道国家大乱了？”我低头回答：“确实大乱了，我不骗你们。”看着他们目瞪口呆半信半疑，我郑重地发誓道：“讲的有一句假话，我不得好死！”正在这时，看守叫喊：“室内活动！”大家一齐站起来，围成一圈，在屋内散步活动。我发觉多数人争着要夹在我前后，紧逼打听社会上还有哪些惊人的情况，如抄家、武斗。中央还有什么人出事……。半小时活动结束，大家又主动坐下，安静、认真地听我继续山南海北地讲述外面世上“新鲜、惊叹、好奇”的动乱故事。这一夜我出乎寻常的健谈，有名有姓，有根有据，每一件触目惊心的事实都说得头头是道。不少老犯人特别要我讲批斗学者名人的惨像，一提到某教授，他们眼神中流露出分外惊怖、同情，又伴和着庆幸自己关在这里躲过一劫的表情。有的喃喃自语，在为一些亲友处境担忧焦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不少人是著名望的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却成了资深的政治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触情伤感不已。这天夜里，我描形绘色地给他们讲到九点，看守叫喊“睡觉”，还有人装着没听见，只是一个劲地要我再讲下去，好象怕第二天再也听不到我的讲说了。可是那位“校长”却再次阻止道：“你们不要再问他了，要害他的，还是赶快睡觉吧！”

这一夜大家都未睡好，不断有人翻身叹气，不断有人到便桶小便。我也是兴奋地久久才入梦乡。第二天早饭后，我发觉大家都闭口不言，闷声等待有什么事发生。八点半，10座的犯人神秘兮兮地获准出去见训导员。1504犯人急忙说：“坏了，这家伙准是去汇报，这下1548要吃苦头了！”我纳闷万分，昨天又没有说过一句反革命言论，只是通报了近来文革发展的大好形势罢了，怎会闯祸呢？半小时后，10座回房来。门外突然严厉叫喊：“1548出来！”我双脚正要跨出门，就被看守一把头发拖到走廊里，接着连拖带踢地拉进一间办公室。

我被看守狠力一推，踉跄要倒地。这时二个凶神恶煞不问青红皂白，暴风雨般的拳头巴掌朝我身上脸上打来，一阵阵刻骨伤筋的剧痛几乎使我窒息。我拼命喊“救命！救命！”五分钟后我已面目全非，一脸鲜血，分不清是嘴里还是鼻孔里流淌出来的，手脚瘫痪倒地，浑身鳞伤累累。旁边看守还说“不经打”。过了一会医生赶到，才阻止了这场残暴毒打。其中一个训导员暴跳如雷，说我一夜放了这么多毒，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顽固派自己讨打找死！不知医生与训导员说了什么，就叫两个劳役犯把我抬头扛脚送进了底楼一牢房。

跌进“疯人圈”

医生拎着药箱紧跟进来，给我头部脸上、手上腿部以及腰背等处止血包扎。我右肩被扭打脱臼，医生以为我骨裂，紧皱眉头给我捏看伤处。确诊是脱臼后，他一手扳住我肩头，一手紧紧抓牢我右手腕，说时慢那时快，只听见“格”地一声，医生使劲地旋复了我右肩的臼位。他因用力过猛，寒冬十二月，额上冒出汗珠。我更剧痛得“哇哇”大叫。医生一边治疗一边训斥我：“照顾你调房，谁知你不识抬举，到那里瞎三话四，自讨苦吃。你对监规背过没有？”他指着墙上写着“不准乱说乱动”的监规，转向对我气愤地瞪了一眼，并丢下了一句忠告：“再不老老实实，以后有得吃苦头！”同劳役犯一起跨出门去，外面“哐啷”一声锁上了牢房。

我用衣袖擦了擦剧痛出来的额上汗珠，自知从头到脚遍体鳞伤，正像刚从敌人俘虏伤兵营里爬出来似的，感到又气愤又好笑，自己怎会幼稚到如此地步，去给素不相识的同牢房犯人们大谈时局，卖弄自己所谓识见聪明。这是什么地方，还有我显露一手的余地吗？还是医生人道，我再不识相，非得再挨毒打不可。一旦给他们失手打死，我算什么东西呢？壮烈牺牲还是畏罪自杀？这般送死，像只死猫死狗，平庸贱卑，很不值得，万万不可再大意了。何况日夜思念的辉哥如今怎样了？家中年高的老父母已够忧伤的了，何必再给他们雪上加霜呢！

自我思索了一番，心里平静不少。我抬头环视室内，猛然发觉对面床上坐着一个老年犯人，他痴呆样子，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凝视着我。数小时后我浑身的伤痛略轻了些，思路才集中到对床的老人身上。看见他眼窝深凹，双目无神，满脸皱皮，那刮削过似的尖突脸颊、嶙峋颧骨，同他原具有的大脑袋极不相称。我还没有力气与他搭话，只是相互沉默地对视着。下午，我体力逐渐一点点恢复，躺在床上试着与这位孤寡老人谨慎交谈起来。我问他三句，他颤颤抖抖地顶多只回答一句，而且常是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

“请问你是哪里人？今年高寿几岁了？”我轻声缓气的问他。

“……”他嘴巴翕动着，嘟嘟囔囔听不清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他沉默了片刻，似乎想从回忆深处钩提起惊人的往事。我以为他不愿说出来，不料他突然冒出二句话：“我是解放前就坐牢的，记不清在牢里蹲了多少年！”

“那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沉默，又是久久的沉默。我正想不去管他，自己迷迷糊糊合一会儿眼睛。我毕竟刚从市监狱医院抢救回所，又遭了一顿毒打，自己已奄奄一息，何必再去多问闲事呢！

“新四军——皖南事变……项英——我冤枉啊！”老人猛发式的莫名其妙的呼喊，把我从迷糊中惊醒。只听他又在唠叨：“我救过毛主席，在江西……AB团。毛主席会救我出去的！”说着，他转向望着窗外的天空，眼神中露出希望的微光，说：“去年是57年反右斗争，今年又在反什么斗争了……斗争，斗争，斗不完的争……”

显然这个老犯人已经神经错乱了，他连今年已是1966年也不知道了。我想自己同这样知觉不清的老人关在一起，日子怎么过下去呢？

晚饭后，老人他做了一套奇形怪状的体操，一会儿似猫跳，一会儿似猿窜，一会儿狼突，一会儿虎扑……看上去有气无力，突然却变为歇斯底里，令人看得心惊胆战、汗毛孔冒冷汗。接着，老人用一盆冷水开始擦洗全身。我又目瞪口呆了，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年纪，他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骨瘦如柴的身体，竟用冷水擦身！我心里冒出一股敬佩其毅力的感觉。他擦身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蒙着薄薄一层皱皮的人体骨骼架子！一颗颧骨嶙峋的大脑袋，耷拉在这副骨头削突的架子上，好像随时都可能要掉下来的危险。我想多年的单身监禁，不断地遭受折磨，使他浑身的肌肉全消耗尽了，都枯萎皱缩了。他头颈下左右的锁骨部位已深凹得足以放个皮球的渊洞，胸前条条肋骨部位像突兀的古筝乐器那样历历可数。我心里刚冒出的敬佩感觉又被一阵恐怖可怕所取代，我看见的真是一具麻木不仁、语无伦次的活骷髅啊！他的用品衣服清一色全是公家的。我想难道他没有家属送用品来，孤家寡人，形影相吊，独自被关埋在死一般沉寂的坟墓里多少年，……我已不敢再猜想下去，惊惶恐怖的心里又被一阵莫名的同情所取代了。我更担心，老人的今天或许就是我自己的明天，我更担心，向来性格倔强的辉哥已被折磨得什么模样了……。

老犯人擦洗毕身子，换好了衣服，就开始蹲坐在便桶上，足足有一个小时。他嘴里哼着二十年代流行的《渔光曲》那样的调子，那像女人嚶嚶泣泣的声音，十分凄楚寒心；忽而又哼起《夜半歌声》中宋丹萍的曲调，如狼嚎，似鬼哭，不由使我猛然想起原在102室单身牢房从马桶里偷听到的毛骨悚然的声音……是他，绝对是他！这么说我是关到了原牢房的隔壁，越听他的嚶泣悲诉、鬼哭狼嚎，在寒冬的深夜我更恐怖惊惶得浑身震颤，上下牙齿都咯咯发抖了。天哪！我又被一阵猛烈嚎叫吓怕着：“我无罪啊！放我出去吧！”“我无罪啊，快放我出去吧！”牢房门上掩盖送饭小窟洞铁皮“咯笃”响了一声，我知道看守在听，在观察，但毫无斥责叫骂。我清楚了，他们早以为老犯人是疯子，这是老疯子每天必做的功课，看守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换了别的犯人如果这样大声嚎叫，早被看守大声痛骂，甚至破门而入打几记耳光。我为自己叹了口气，心想真是倒霉之极，好不容易跳出孤寂单关的坟场，却又跌进了这个“疯人圈”。老人早已被逼疯了，牢房里他的脏衣服乱扔四角，阵阵臭味扑鼻难熬，岂不像我老家无锡乡间所说的“猪圈”呢？这里住着的绝不是猪，而是人，是随时随刻肆无忌惮发疯的老犯人。这是牢房吗？不是，是名副其实的“疯人圈”！这夜我无法入眠，只好眼睁睁陪看老人的疯狂表演。原来训导员们毒打了我一顿不够，硬把我抬进这“疯人圈”，让我再经历惊惧恐怖的气氛，不啻给我精神上又一顿狠毒殴打！我要镇定自己，绝不能真的也被吓疯了。这样一想，我真的又同情起这位老人了。应该说，是冷漠残酷、孤寂死气的环境挤压着他，无期单身监禁杜绝了他重返人间的希望，对于无罪的反复争辩换来的是嗤之以鼻的不屑一顾，或是曾经给予的毒骂暴打。他的衰老与疾病袭击着生理健康，而漫长岁月的孤寂沉闷更夺去了精神上全部寄托与希望，一切成了梦幻般地泡沫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绝望的心理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使他失去对生命意义的丝毫留恋与信心。他疯了，真的疯了。可怜的老人！可怜的老政治犯！

在百感交集、心潮起伏、双眼凝望着老人蜷缩颤栗的睡形中，迎来了窗外黎明的曙光。天亮了，我迫切希望马上离开这个“疯人圈”。我想，如果长期与这老疯子关在一起，不要到两个星期我也会发疯的。回忆昨天挨打后，好像听到医生对训导员说过，他刚出医院，暂时把他关一天吧。记得抬我进来时，除了劳役犯带给我一条被子，其余行李物件仍在204室。果然，上午九点，我又被看守带到二楼训导室。这次训导员火气消了很多，他严肃训斥我不该在关押期间继续犯罪，像煞有介事的读了几张所谓同牢房人揭发我散布反动言论，也就是他们起劲地催问我所说的外面文革情况，断章取义添油加醋、上纲上线。训导员命令我在上面签字盖手印，承认自己确实又犯了罪。他又威胁说：你如果再不老实就把你长期关在昨夜的牢房里。我想这些事实散布算什么反动言论？对比起我辉哥所写的批驳文革的万言书，实在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所以我爽快地签字抹手印了事。为了以示处罚，我被反铐双手，随训导员带回到204牢房。

牢房“小宠儿”

踏进204牢房，反铐着双手的我，低头站在昨天热烈拥着我讲话、今天个个目惊冷漠的人群中间。根据训导员的命令，“回牢房消毒，说明讲的全是造谣，是反革命本质大暴露”，我清清喉咙，对全体犯人说：“我1548是个出身反革命家庭的人，父亲、哥哥都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昨天我在牢里讲的话全是放毒，反革命言论，是污蔑攻击文化大革命，内容全是伪造，是我编出来的。经过政府的教育，我知错、认罪、改正，请原谅。”

说着说着，我满腹委屈涌上心头，眼睛里冒出了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滚滚掉下。我想是你们大家拼命催问我的，我只是真诚无虚地如实告诉你们外面的真相，我哪有本领编造出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时事。想不到逼了我讲又去告密我，让我遭罪受罚，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训导员见我低头认罪得眼泪汪汪，以为是真心悔过，严肃而缓和地说道：“1548认罪服罪的态度还算是好的，以后如再乱说乱动，就要加倍惩处！”他又对全牢房老犯人们训斥了几句，

规定他们再也不许听信传言，谁听到谁就要检举揭发。训导员以赞许的目光看了看10座，转身出去，牢门“嘭”的一声关上了。

众犯人见我低头站着示众的一副可怜悲惨像，昨天早上出门还是好好的，今天回来却是鼻青脸肿，反铐双手，身上伤痕累累，他们自觉内疚，祸因他们渴望知道外面局势，不料使我遭受如此惨虐。几个犯人前来争着帮我擦眼泪，安慰我不要伤心，小心地扶我坐下来，谁知我双手被背铐着坐不下，十双斥责的眼光盯着10座看。1504带头气愤地挖苦他：“共产党员的立场来坐什么牢，早可以释放了。想捞救命稻草，忍心陷害别人。老婆可以跟你复婚了，子女可以认你这个立场坚定的反革命爸爸了！”

10座在众人冷言热讽下，像吊死鬼擦了粉，脸色刷白，僵硬地呆坐着一动不动。中午开饭时，他自知理亏，主动讨好我，报告看守，说1548反铐着没法吃饭，可否换正铐吃饭。看守丢进来“活该”二字，理也不理，关上了送饭的小框洞。他只好说“我来喂你吃”，并假惺惺问我：“挨打得厉害吗？”我反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不听、不相信也罢了，也可以阻止我讲，可是你自己也问了我不少事，却又去告发我，良心何在？你也有年青子女，打在你孩子身上怎么想？我虽然年青，但身有残疾，又刚从医院回来，经不起他们这么厉害地毒打，差一点小命要被你害掉了！”他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过后不多日子，他被提审回牢，悄悄对我说：“刘少奇果然出事了，”是来外调的人告诉他的。又说“上次我实在不相信你的话，认为你是在造谣，去报告是想证实这件事，想不到害你吃了大苦头，实在对不起你。”这次表露了真诚的歉意。从此他反而对我好起来。他是一位党员处长干部，曾在市委和党校工作，打成右派才关进这里。他有个儿子与我同年。他说看到我就想起自己儿子。

我国古人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经过这场自讨苦吃的折腾后，我自己学得“识相”了许多，同牢房犯人也从中看到我天真善良，没有心计，不念旧恶，反而博得了他们的一致好感。他们处处维护我，帮助我。在我被反铐的一星期中，吃饭、睡觉、大小便，他们都主动抢着帮我忙。记得第一天我因双手反铐无法睡觉坐了一夜。第二天夜里，6座的飞行员（据说是美蒋派遣特务），主动与11座的大学生换了睡位，躺在我身边。等大家睡下后，他从被子里伸出双手，悄悄麻利地把我手铐打开。他轻轻告诉我，这是付普通的羊角铐，用铁片或细绳子就能开启。

随着一天天的牢狱生活，我与同牢房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向他们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身世。我父亲是个历史反革命，曾在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三哥是右派又是反革命，这次又犯下了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我因替三哥投寄批驳“十六条”的匿名信而被捉进监牢。我讲了父亲当时曾为共产党解放区运送过大批救济物资，又讲了辉哥如何博览中外群书，向往“民主、自由、平等”，坚决反对个人专制独裁等言行。我家庭的不幸遭遇与辉哥的不屈不挠政治反抗经历博得了大家的共鸣。一些老犯人与我父亲一样，解放后因解放前的工作经历、政历问题被无休止的审查，对我的艰难身世心有同感；几位年轻些的也同样有我辉哥那种敢于独立思考、不做顺民的骨气。就这样，我与同牢房十一位犯人都有了共同语言。他们很惊讶我小小年纪怎么有那样胆大妄为的思想和行为，估计我是受了哥哥长年的熏陶影响，所以对55年反胡风、57年反右派的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看得这么深。他们嬉称我有“反革命遗传因子”。这些五、六十岁的老犯人，看着我就勾起他们长期思念儿女的感情，我从辉哥那里学到的虚心好学、勤恳待人的有教养品德，更使他们把我当作自己的子女对待。我在204室牢房中成了众犯人的宠儿。大家喜欢我，称呼我“小兄弟”。我年青活跃、充满真诚的好奇言行，给这死气沉沉、坟墓般的牢房带来了活力。其它人之间都称番号，惟独对我亲切地称“小兄弟”。我虽然坐在牢里，失去了自由，生活很艰苦，但如处在一家人之中，产生了一种幸运感。看来前一时期我所作的自我折磨的抗争没有白做，即使因不慎而被毒打并关进“疯人圈”一夜，也使我增长了见识，奠定了以后长期牢狱生活艰苦度日的基础。

记得回到204室当天，我就告诉大家昨天与一个疯子关在一起的经过。我刚说完，他们纷纷说，那确实是这里第一看守所关得时间最长、年纪最老的犯人。那老人本是项英的秘书，谁也讲不清他到底哪年进来。据说上海解放前，他就出事被关押在解放区，后从南京转解来上海进入一所。我们牢房里只有校长与他同关过两个月。老校长告诉我，这个人的背景相当深，他与共产党最高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共处过，特别在新四军时期与刘少奇、饶漱石、陈毅等人都共过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何要被无期关押，据说是与项英之死有关。他早几年就发疯了，听说曾有一个犯人同他共住一年不到也疯了，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单身监禁。后来对凡是严重违反狱规的犯人临时处罚，就关进到他那房去活受罪。老校长轻声地告诉我，这里解放前原是国民党市政工部局的牢房，当年王孝和就是关在老疯子的那间里。他又拍拍我肩头亲切地说：“幸好你到那里只关了一夜天，否则我们再也见不到你这活泼聪明的小兄弟了！”

我珍惜自己幸运脱离了“疯人圈”，更珍惜204房老犯人们对我的温暖与帮助，所以我决心用加倍的勤快服务来回报他们。在这16平方米牢房内关住着12个犯人，其中多数是年近花甲老人，每天的吃喝拉睡的卫生事务，三顿发饭、二次开水、二次冷水，都需要身体好、反应灵活的年青人来担负。我主动参与学做牢房的公共事务。我很佩服大学生和飞行员每天早晨起床像打仗，20分钟帮助大家整理内务完毕，按部就位，等待十二盆冷水放进来，能做到尽量不让皮管水流到房地地板上，再用20分钟每人必须洗刷完毕。其间从起床开始12人有序解大便，然后利用洗刷后的脏水冲便桶。接着领早饭的酱菜和每人一天150CC的开水。这对犯人来说都是很珍贵的“营养品”。有的老犯人一小块酱菜能品嚼一上午，一粒蒜豆在嘴里含味一小时。为此大家都眼睁睁的看着对酱菜与开水的绝对平均分配。我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由于自小听觉灵敏，我能非常精确听出发开水和酱菜已到了第几间牢房，所以当看守一打开小洞，我的脸盆已凑上，并连声有礼貌地说“谢谢管理员”，博得送饭伙司员与看守的好感，所以常得到发过一圈多余下来的酱菜与稀粥。全牢房的人都称赞我凭着“最动听的童声请求”获得了意外的“战利品”。我把多余送来的全给了几位年老犯人。他们很感激我，我也相当得意。“小兄弟”、“小兄弟”的亲热呼叫此起彼伏，整天不断。

幸尝智慧果

辉哥在被打成右派后，日常劳动之余，一头钻进了古今中外名著经典之中，从人类知识海洋里寻求人生哲理、生命真谛，使他豁然开通，敢于思考，献身真理。所以他有“幸尝智慧果”的警句。我因追随辉哥，亦被关进牢房，经过誓死抗争，来到204房这十一位犯人中间，发觉这批政治犯都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正如他们所说，这上海第一看守所是华东地区关押政治犯的重地，称“模范监狱”，没有级别档次的是进不来的。其关押人员或外籍犯人，或派遣特务，或市级文教卫生系统的名人教授及市属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凡政治犯的重刑犯、无期或死刑犯，都经过一所关押判决。它属市检察院起诉，中、高级法院判决，与一般区、县级的不同。老犯人还告诉我，一所判出去的犯人一般在10年徒刑以上，在这里关四五年是不稀奇的。他们对我的无保留诉说，或称循循指导，既使我感激，又使我焦虑，真不知辉哥的命运如何？又不知我自己要判几年？看来我要作好长期坐牢的充分准备。我想，与其混天消日下去，还不如趁遇上这些有知识肯传教的人的特殊机缘，向他们虚心求教。辉哥曾指教我，一个人要像海绵吸水那般永不满足地吸取知识。我现今不正好有这机遇了吗？想通了这点，我一方面日常老实地服役，勤恳给同牢房人服务，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了解他们的过去经历，就各人的某一专长虚心请教。所以从大环境上说我已剥夺了人身自由，但在牢房这小环境，我又能自由地学习各种知识，我似乎踏进了一座社会最低层、却蕴藏着万宝全书的特殊大学里。

我开始了解同监十一人的大概情况。1座是位50多岁的韩国籍的国际海员，63年进所。2座是人称“校长”的70多岁长者，他姓郁，解放前曾任上海国民党市政工部局局长，解放

后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据说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的同辈学弟。他是1955年进所的，是牢房中最老的犯人。3座是位作家、诗人，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1956年进所。4座是位传教士，我国北方人，早年在梵蒂冈深造，后派回到中国。5座是位日本人，曾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据说与鲁迅好友日本内山丸造先生是师生关系，60多岁，他们两人都是60年入监的。6座就是曾夜晚帮我打开反铐的飞行员，浙江人，现年39岁，据说是美蒋派遣特务，他是62年底在福建被抓的。7座是复旦大学右派教授，他在57年底进所。8座是位45岁的香港商人，9座是原英国在沪最大商行卜内门的管事，他们两人是63年进来的。10座就是曾告密我的一位共产党处级干部，姓曹，50多岁。11座是华东政法大学毕业，人称他“大学生”，在市公安局（政保处）做过实习审讯员，他们两人是64年左右进所的。我排为第12座，最年轻，刚交20岁，实足19岁。听老犯人讲，像我这样年龄进一所是没有见过的。他们见我很乖巧，拜所有人为师，都敬爱他们，能讨他们喜欢，所以都乐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传授给我。我已学会了同他们各人个别接触的讲话技巧。为了轮流请教，我又成了监房里唯一可以随便与人调换座位的幸运儿，他们乐意为我提供方便。

在中国现代史上，先后有两位姓胡的海内外瞩目的文化名人，前一位是胡适，后一位是胡风。进监前，我已从辉哥处略知他们两人的情况，但真正比较深刻了解，还是请教了同牢房的两位老先生才清楚的。

2座的郁校长告诉我：胡适老先生在中国享誉盛名四十年而不衰。他的一生犹如玻璃缸里的一条大金鱼，他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都被中华同胞所注视。他是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人，包括像毛泽东等中共早期一代革命家都受过他的启蒙。胡适是五四革命运动的首席领导者，他倡导民主、科学，猛击独裁、愚昧，开创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崭新时代，影响深远，直至今天。胡适堪称现代中国文坛的“圣人”。陈独秀与胡适原是挚友，早年在北大陈强拉胡倒向革命，胡对陈说：“你相信你的马克思，我相信我的杜威，各不相强，何必都走一条路。”陈独秀晚年又回到了胡的思想领域。胡适与共产党的对立，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共产党宛如一支革命火炬，胡适犹如一盆改良主义清水。水与火如何相容呢？胡适本人是位性情憨厚、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提携、呵护、熏陶出大批杰出精英弟子，像罗尔纲、吴晗、千家驹、刘海粟、李四光、罗隆基、吴健雄……等等。郁校长告诉我一件事，“五四”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一次他旁听胡适先生一堂课后，突然萌发了一个问题，想向胡适先生请教，不料，当胡适得知他是一个旁听生，而不是一个正式大学生时，便拒绝同他交谈，直到晚年，毛还深深记恨这件事。

据郁校长分析，毛泽东最怕胡适思想中的二点：第一：提倡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第二，提倡怀疑，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一切信仰，必须要经过怀疑、考证后才可以相信。所谓“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正是认识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解放后毛泽东在中国大陆首起掀起批判胡适、围剿胡适的运动，因为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受胡适思想影响实在太深太广了。当时郭沫若、周扬纷纷披挂上阵。郁校长他就是在场运动中受难后进监狱的。

郁老先生还告诉我：现在报上常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姓大批失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在许多国家并非如此。他在美国待了多年，知道世界第二次产业革命之际，美国一路领先，快速发展，只用了二十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发达国家。1913年美国的钢产量已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美国早已成为世界的小麦王国、棉花王国、奶牛王国，国内铁路公路纵横贯通，东西南北交通十分便利。那盛兴与实力确为各国望尘莫及。这也正是胡适先生所崇尚的自由思想客观实践的杰出范例。

关于胡适的故事，来自台湾的6座飞行员补充告诉我：胡适一世清贫，晚年更是洁身自好，连住医院的医疗费用都支付不出，要靠朋友救济。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大会上演说突然倒下，与世长辞。他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他说台北民众黑压压的象海浪般簇拥灵车，凭吊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台湾所有城市空巷路祭，万人同哭。据说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许多人伤痛悼念他。可见历史是公正的，民心是衡量是非的真正天秤。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事是我国解放后妇孺皆知的重大政治案件。我从同案人3座老先生处才窥悉其中内幕。他介绍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不仅仅是针对周扬、林默涵在文坛推行霸道主义，而且也是针对整个时局个人专权抬头的坏作风的。不料他的一片忠心净言，却成了逆耳讨罪，不但不被理解，反而遭受了弥天大祸。胡风虽然没能阻止“文化专制局面”的到来与疯狂，然而他的预言是勇敢的。他的道德文章，他执着于真理，因忠得咎，以直报怨的悲剧遭遇，犹如中国古代的屈原，司马迁。3座老先生还告诉我胡风与鲁迅师生情谊的许多故事。鲁迅死时，胡风为首的一批弟子冯雪峰、肖军等都悲痛欲绝。胡风的巨大魅力，在于发扬了鲁迅人格精神所表现的持之以恒的表率作用。3座老先生可笑地说，在上海胡风同仁们被拘捕不久，肃反运动开始，那些坚决执行整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脑们，如市委副书记潘汉年、公安局长杨帆，都也被送进一所与他同为囚犯。我告诉老先生，我三哥文辉最崇敬胡风，称他为“殉道者”。正如辉哥所说：“可笑可悲的是当时积极参与整胡风的文化界名人周扬，林默涵，包括被逼表态的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茅盾……没有一个逃脱得胡风的下场。”从反胡风，到反右派，到这场文化大革命，都是造神运动产生的专制铁拳，更残酷更广泛地毁灭一切先进文化，全面摧毁着一切善良知识分子和全国全党的正直忠贞之士的人格与心灵，包括残酷打击最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灾难。

在牢房的特殊大学中，我如饥似渴求教学习，使我心胸更广，心眼更亮，似乎觉得这样的坐牢“待遇”还不算坏。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